

论中岛敦文学中的“附体”问题 ——兼考与庄子“物化”思想的相似性

孙 树林

昭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作为中岛敦的首部创作集《光与风与梦》由筑摩书房刊出，其作品包括《斗南先生》、《猎虎》、《风与光与梦》和《古谭》。其中，《古谭》内含有《狐狸附体》、《木乃伊》、《山月记》、《文字祸》四部短篇。

《古谭》中的《山月记》被认为是中岛敦的代表作，问世以来相关评论颇丰，而其余三篇在相当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直到昭和四十年九月，佐佐木充在《国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山月记〉论——〈古谭〉的世界》¹⁾，才得以从整体上对《古谭》进行了较为周全的考察与评论。然而，佐佐木的论文也并未对其进行均等的考论，而只是以《山月记》为主，将其余三篇作为其周边要素抑或辅助材料来加以考察的。翌年，鹭只雄发表了《论中岛敦〈古谭〉》²⁾一文，对《古谭》中的各篇皆做了力度均衡的研究，从而开创了对该作品进行系统研究的新局面。

佐佐木在论及《古谭》时，以柳田国男的《口承文学史考》中的相关理论为基准，就四篇中“文字·语言”的形态和意义为轴心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该作品的意旨是在昭示“‘文字·语言’是超越人类而永远不灭的存在”，是“异常的世界的一大特征”，在其中“潜藏着希冀永生这一人类根本的欲望。”因此，作者将《古谭》的文学主题风格定位为“浪漫”。与此相对，鹭只雄认为该小说的主题是“表现了作者那种形而上学式的不安”，是作者情感的一种文学外化。二者的相关论述，在中岛敦研究史中呈现出普遍的认同性和持续的稳定性，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古谭》的评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从内容构成上看，《古谭》是中岛敦文艺创造及表现形式的拓展和完善；从主题的经营上看，则是作者既往文学主题的延续和深化。如果从这一视角来考察该作品的话，上述二者的相关评述无疑具有普遍的概括性。但与此同时，二者却都忽视了《古谭》中存在的“超自我”问题尤其是其与其他作品的内在联系，而这一问题又与潜匿于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通过对“超自我”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视到《狐狸附体》中的隐含主题以及其存在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故此，本文仅就《古谭》中的一篇《狐狸附体》³⁾为考察对象，探讨作者长期追逐的“超自我”这一存在的历史及其形态，并探求其与庄子哲学思想的相像性。

在考察该作品之前，先介绍一下其梗概。

在远古的（斯基太人）部落里，住着一个名叫夏克的极为普通的男人。受来自北方游牧民的袭击，使得夏克的弟弟战死沙场。然而，其亡灵阴魂不散，又附到了哥哥夏克身上，借着哥哥之口讲述死亡的世界。以此为开端，从此以后，夏克便接连不断地招致形形色色的异灵附体，使其讲述出诸多故事。因此，曾几何时，部落里的人们便纷纷围他而坐，不断地要求他讲述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但不久，有人指出，夏克能讲故事的原因并非附体所致，而是出自他自己的杜撰。如此一来，夏克自己也觉得似乎是自己所为。然而，转念一想，为什么自己能连续数月不知疲倦地从事这般奇妙的工作？这使他大惑不解。

如此看来，依然是附体所为。尔后，他所讲故事的内容从动物等自然生物渐次过度到人间，其中，有许多故事使人们联想到了长老们的龌龊之事与绯闻。日月如流，冬去春来，人们发现站在原野上的夏克一扫往日风貌，变得呆头呆脑；并且，他所讲的故事除了炒剩饭外，别无一点新东西。因此，人们私语道：夏克的附体走了。于是，自己昔日的绯闻与龌龊被揭露的长老们便私下里密谋将夏克杀掉。故此，夏克被定罪为给部落带来凶祸的灾星，遂依照祖先留下的定规将其杀掉。并且，更不幸的是，夏克被投入部落宴飧的大锅里煮熟后被部落的族人们吃掉。就这样，一个诗人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佐佐木充认为，《狐狸附体》是“人类最初的‘诗人’之诞生与毁灭的故事，”⁴⁾夏克依据自己的想像，并依附在其它的媒介上来讲述故事，这一行为之所以使夏克如此感兴趣，其根本在于这本身是“自我的转生和变化，是通往永生不死的通路。他的登场，意味着人们试图通过‘文字·语言’去窥视永远和无限等东西。”鹭只雄也认为“《狐狸附体》是告示人类历史上最早期诗人诞生的故事。”“它揭示这样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人的悲剧命运：诗人存在的悲痛，艺术家的苦恼。即，当其尚未被讴歌（或尚不能讴歌）时，得到的只能是轻蔑和嘲笑；然而一旦博得喝彩后再停止讴歌的话，等待他的只能是对其存在的无视和迫害。在此，作者借助古代诗人诞生的故事，将这一主题形象地表现出来。”⁵⁾

诚然，从西方文艺批评视角来看，《狐狸附体》的主题无疑为“人类最初的‘诗人’之诞生与毁灭的故事”，并具有“诗人悲剧命运”的“典型性”。然而，如果跳出《狐狸附体》，从宏观上考察一下中岛敦创作的全过程的话，便不难发现：《狐狸附体》中“附体”问题并非是孤立单一的，它是中岛敦索求的永恒主题之特殊表现形式之一，是其永恒主题的延续和深化。

在这个故事中，登场的主人公是尚处于未开化时期的夏克，但是，讲述出许许多多另外空间的离奇故事的并不是夏克本人，而是以他的身躯为载体的外灵，换言之，夏克讲故事这一行为是在被依附并凌驾于他之上的绝对存在的操纵下完成的。因此，夏克虽然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但真正的角色是其背后存在的“操纵者”；并且，诗人的整个命运也始终掌控在“操纵者”的手中。因此，只有将“操纵者”验明正身，方能打开进入小说深处的通道。

在中岛敦的文学中，“附体”现象并非是在《狐狸附体》中首次登场的，是有它的史前历史的，而《狐狸附体》中的“附体”只不过是其表现形态中的一种，仅仅是其锁链中一环而已。下面，略考一下其历史。

三造感到一种令人不快的阴冷。虽然不知何故，但只有“不免蛇身”一语从诗的整体意义中游离出来，微妙地威胁着三造。他自身有一种预感：自己也会和伯父一样，一生无所成就，在自嘲中了结人生。但是，这种威胁并非出自于这种预感，是一种更为难以辨明的令人感到厌恶般的不快。在昏暗的灯光下，他望着闭着眼睛伴随着列车不停地摇晃的伯父，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看似妄语，而在另外世界里就会变成绝非侈谈的。”于是，伯父诗中蛇身二字似乎活了起来，甚至感到它弯弯曲曲地扭动着身子在车厢内爬来爬去。

（《斗南先生》）

这是《斗南先生》中的一节，其中的“蛇身”可以说是中岛敦文学中有关“一身二我”或是“附体”问题系列之滥觞。在此，这种“难以辨明的令人感到厌恶般的不快”，并非只是三造精神作用而导致的肉体的条件反射或是错觉，从作者的表述上看，该是一种近乎真实的切身感受或体验。正因为如此，

三造才会发出如此的推断：“在这个世界看似妄语，而在另外世界里就会变成绝非侈谈的。”

斗南自身是以何种心绪吟咏“恶人恶笔，自欺欺人；亿千万劫，不免蛇身”的，目前尚难以考证；但是，从三造的视角来看，正因为斗南先生被“蛇”附体，方才导致他那种放荡不羁和奇异荒诞的言行的。平素，由于被“蛇”附体，而言行乖戾；而当他睡眠时，“蛇”便爬出他的肌体，显现出其真形来。也就是说，在这里，斗南已不再是具有独立自我的自己，已变成彻头彻尾的“蛇”的载体和代言人。这，或许是导致“恶人恶笔，自欺欺人”的症结之所在，也应该是作者吟咏出“亿千万劫，不免蛇身”之句的根本原因。

在《斗南先生》中，中岛敦虽然对“附体”问题给予了莫大的关注，并将表现在斗南身上的乖戾现象疑为由于“蛇”的存在所致，但是，他仅仅是将问题提出而已，并没有试图去考察其真伪和论证其存在的实质，也就是说，由于《斗南先生》中的“附体”问题是中岛敦文学中对该问题探讨的原点，因此，也就具有其不确切的原始而朦胧的性质。

那么，到了《变色龙日记》，这一“附体”便发生了嬗变。

我，似乎是由组成我的物资要素（诸工具）和操控它们的某个东西所构成的机器人。这，实在是无奈。此前，我刚一打阿欠，突然感到：就这个动作似乎也是在那个操控者的操控下做出来的，当时我大吃一惊，随即放下了刚刚伸出去的手。（《变色龙日记》）

当然，此处的“操控者”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无疑其与《斗南先生》中的“蛇”具有诸多相同性。将二者的相似点联系起来考察的话，便不难发现：在自身被另外异灵直接操控这一点上，《变色龙日记》的主人公“我”与斗南先生有着极为相像的生理体验。因此，与斗南表现为“不免蛇身”相对，“我”则表现为变成了“机器人”，并且，二者又皆因异灵入侵而丧失了自我。不言而喻，《变色龙日记》是中岛敦进一步探讨附体问题的又一文学实践，“操控者”则是昔日“蛇”的新变化，而它们被统一于隐藏于“另外世界”而控制人的“附体”这一具有共性的内涵中。

从对于这个“附体”现象所表现出的态度上看，在《斗南先生》中仅仅是一种近似于客观的描述和生理性的厌恶感；而在《变色龙日记》中，我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惶惑与不安。因此，作者才会发出如此的道白：“我幼小时，甚至曾怀疑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可能都是由狐狸变的。”通过如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粗略地窥视到中岛敦“附体”问题初期演化的轨迹。

到了《狼疾记》，这一“附体”一改往日只是隐形于另外空间来操控人类的做法，而是以某一种实在显现于这个世界，并直截了当地操控人。

在《狼疾记》中，“我”在餐馆吃饭时看到了一个男子，他的颈部长着一个怪异而硕大的溜子，“我”对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别无任何稀奇之处的身体现象产生了特别的关注，并进行深刻地推论。

对三造而言，这怪异而硕大的溜子使他联想到了希腊悲剧中心术不正的坏神们，这怪异而硕大的溜子似乎是这样一个丑陋的寄生者：它是个完全独立于人的肉体而心地极坏的个体存在，它蹂躏这人的意志，当其寄宿的主人入睡时，只有它偷偷地不眠并嘲笑着。每每这时，他就会持有一种无名状的不快与不安，思虑人的意志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之狭窄（抑或皆无）。我等是为了不属于我们的意志的某一不可理喻的东西而出生，我等又为这个不

可理喻的东西而死掉。事实上，我等每天晚上都是为了某一东西而陷入超越我们意志的被称为睡眠的不可思议的状态中。

上述这段引用，与《斗南先生》中有关蛇的描述同出一辙，二者都是在描述寄生在他人身上的令人不快的“附体”。这一点，与《变色龙日记》中的“操纵者”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只是表述不同而已。《斗南先生》中的蛇与其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莫如说是一种第六感觉或在观念上的一种形象化的闪现；在《变色龙日记》中，中岛敦虽然明确地提出了“操控者”这一概念，但并未对其予以具体阐述和深究。但是，到了《狼疾记》，其描述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者对“附体”的描述不仅生动具体而且对其认识得也是入木三分的：“这怪异而硕大的瘤子使他联想到了希腊悲剧中心术不正的坏神”，它是“一个丑陋的寄生者”，“它是个完全独立于人的肉体的心地极坏的个体存在，它蹂躏这人的意志”，故此，人的意志能独立发挥作用的范围才变得极为“狭窄（抑或皆无）”，“我等是为了不属于我们的意志的某一不可理喻的东西而出生，又为这个不可理喻的东西而死掉。”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说，《狼疾记》中有关“附体”的描述不仅是在前两部作品基础之上的新发展，而是发生了判若天地的质变，是该问题的集大成者。从中岛敦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在少年时代便持有这种怀疑：自己并非完全是真正的自己，是被外来“附体”和“操控者”所控制的，人们为其而生又为其而亡，完全丧失了自我；再者，这个世上除了自己之外，都是狐狸变的。简言之，中岛敦的这些怀疑，在《斗南先生》中初露端倪，经过《变色龙日记》使其获得理性上的认识，到了《狼疾记》使其得以形象表述的明确具体化和对其认识的本质化。

二

如前所述，在《狐狸附体》中，被附体的主人公夏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那么，随着夏克在表象上的三个变化，其本身实质上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其原因是什么呢？

曾经是这个部落中“最为平凡”的夏克，是在凝望着死去的弟弟时而被暴死的弟弟的冤魂附体的。起初，他讲述故事的内容是弟弟被砍断的手臂和头颅在借助他的口在描述自己，以及被活活剥皮的野兽和战场的状况等。尔后，夏克便陆续讲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来。也就是说，他的身体起初是被弟弟的手、头颅等所依附，并以此为契机，接下来又有形形色色的灵体依次依附到他身上的。因此，小说中叙述道：“迄今为止，也有被附体的男人或是女人，但是，形形色色的灵体附在一个人身上这还是首例。”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夏克被附体后的变化。即，原本“最为平凡”的他被附体之后即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原本“最为平凡”的人显示出其超凡绝伦的才能，一跃成为故事家和诗人。这种变化，可称得上是脱胎换骨；而实质上，这一变化却又是被动的，是原本的自我被外来灵体抑制住或是被从躯体中逐出，外来灵体取而代之，占据并牢牢地控制了由各种物质要素构成的躯体而成为其真正的统治者。故此，原本自我已不复存在，这个躯体也就堕落成为一个“机器人”。并且，这一躯体被外来灵体占领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每当一个灵体离开后，就会又有一个新的灵体来占领或是接管这个肉体，如此循环往复。也就是说，这时的自我，是处于“为了某一东西而陷入超越我们意志的被称为睡眠的不可思议的状态中”，是实质上的“自我”消失；而此时的“我”的躯体只是一个空壳，任凭外来灵体任意依附。这些，是与一般意义上的附体现象具有共性的。

起初，人们都认为：“生来平庸的夏克能讲述出那么动听的故事来，一定是被附体的结果”。然而，

到了第二阶段，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夏克渐次怀疑到：讲故事的也许不是附体，而是自己。其理由是，一来自己并非恍恍惚惚，更没有疯疯癫癫，所讲的故事也是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然而，从各种情况来判断，这种事情依然不是自己所能为之事，他的故事中出现的各种场面和情景的描述即十分逼真、生动，又细致、具体，而这些都是在其想像中诞生的，这便使他自己也大惑不解，因为这确实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才能。到头来，他还是将这一现象的产生归结为附体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看似与附体现象存在着些许差异的特殊现象呢？简言之，这并非是夏克自己行为的结果，而是附体的固定化和完全掌控了夏克的一种具体表象。其实，在《狼疾记》中，作者业已向我们透露了附体完全操纵人的具体形态：其时，人自由意识的活动范围变得及小或是完全丧失，身体也完全由另外灵体公开操纵，自身完全沦落为为另外灵体而生而死的“机器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人的肉体与精神一道皆为外来灵体所掌控，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肉体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和完美和谐，而实质上被附体的人业已完全没有了自己，外来灵体对肉体的操控已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达到了精神与形体的统一。换言之，正因为夏克身上发生了如上的变化，才使得他将并非来自于自己的思维当成了自己，认为出自于这一意识的一切思想和念头都是自己所为，将自己与附体完全一体化。简言之，这第二个阶段是夏克自我完全丧失的阶段。

第三阶段。在冬日里，不间断地讲故事的夏克，到了春天，“目光无神，表情呆滞。人们发现他已经不再讲故事了。即便是强求他讲述，也只不过是炒剩饭而已。非但如此，即便是炒剩饭也是不能完整地讲述，其语言更是失去了往日的色彩。于是，人们纷纷议论道：“很明显，夏克身上的附体走了。”于是，夏克不仅不能讲故事，目光呆滞，神情恍惚，还丧失了昔日勤奋的习惯，终日无所事事，整日呆愣愣地望着湖面。也就是说，夏克不仅没能恢复到从前的自我，甚至衰退到连昔日“最为平凡的人”还不如的“呆傻”状态。那么，仅就现象而论，夏克所处的境遇是颇为异常的；从医学和心理学角度看，这该是精神病发生的前兆。其实，从小说的内容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夏克的这种状态可称其为是真正的魂不守舍，是自我不在的典型特征。究其原因，是由于自我（精神）被附体赶出肉体，肉体便成了外来灵体的载体，而真正的自我则不得不处于无所依附的长期与肉体分离的游离状态。那么，当形形色色的外来灵体纷纷离去后，业已离开肉体许久的精神一时间很难回复到肉体上，并达到往日那种形神高度统一的完美与和谐。正因为如此，夏克方才表现出这种魂不守舍的形神相驳的异常状态来的。

夏克之被杀，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他整天只一味地讲故事，完全放弃了作为部落民必须从事的劳动，并将其波及到其他年轻人，他周围的年轻人只顾听他说故事，而怠于劳作。见此情形，长老们认定这是部落的不祥之兆，遂下决心清除祸害；其二，夏克的故事中许多大有影射长老们的私弊之嫌，被触怒了的长老们假公济私，要借刀杀人。

从尚处于文明低级阶段的具体情况看，夏克被杀一事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都存在着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夏克被杀的原因不在长老们，而是夏克的自作自受。然而，对于被投入宴飨之锅的夏克来说着实是无辜的，是天降横祸般的暴死，甚至没容他有一句辩解。但是，从潜藏在该小说中主题来看，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关键原因其实并不在长老们。

从《斗南先生》开始，“操纵者”这一角色便在中岛敦文学中登场，到了《变色龙日记》和《狼疾记》时，其存在形态和性质等业已具体化和明确化。在这里，中岛敦暗示读者：在人存在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操纵者”，人们的存在及命运往往是被这些“操纵者”所掌控的。因此，中岛敦才发出这般叹道：人的自由意识所能活动的范围是如此之狭窄（或曰全无）！“我等是为了不属于我们的意志的某一

不可理喻的东西而出生”，“又为这个不可理喻的东西而死掉。”一言以蔽之，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意识往往是被来自于另外空间的灵体所控制的，因此其行为也就或只能成为被外来灵体操控的一种具体体现了。如果将中岛敦在其文学中的这一哲学思考还原到《狐狸附体》中看，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杀死夏克的并非是长老，而是其作为背后因素的“操纵者”，是“操纵者”借助长老之手将夏克灭掉的。进一步说，当夏克被各种外来灵体依附时，他这个载体是十分有用的，因而才能体现出他非凡的才能，而当形形色色的灵体纷纷退出其躯体时，他这个载体也就变得一钱不值，因此，作为“操控者”的外来灵体们便过河拆桥，利用长老们将他灭掉。

如前所述，《狐狸附体》被认为是“人类最初诗人诞生和死亡的故事”，是“诗人存在的悲剧以及艺术家的苦恼”和“诗人命运的典型写照”。从近现代西方文艺批评的视角来看，这等论点是合理的，而且是周延的。然而，纵观中岛敦的文学，尤其是通过对潜在其中的“操控者”这一文学典型形象的深入剖析后便不难发现：《狐狸附体》绝非只局限在近现代文艺理论所界定的范围之内，它是深受中国思想影响的中岛敦文学特质的生动而具体的体现，是中岛敦试图通过文艺手法去进行哲学思辨和真理追逐的结晶。更确切地说，《狐狸附体》不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形象塑造和形而上学式的哲学思考的层次中，而是中岛敦对于生命存在的执着追逐的具体实践。

为了更深刻认识中岛敦文学中附体这一典型形象，下面归纳一下其中岛敦文学中发展演变过程。

出典	形态	感觉	分量	性质
《斗南先生》	蛇身（隐形）	不快	插话	被操控
《狼疾记》	毒瘤（实在）	不快/不安	插话+感觉	意志被蹂躏
《变色龙日记》	操控者（隐性）	颤栗	深刻的感觉	被操控
《狐狸附体》	附体（一体化）	惊惧	全篇	身心皆被操控

从上述归纳可以看出，“操控者”的存在是从潜在走向表面，从感觉发展为实在，从插话演变为全篇。从操控的时间来看，从短时间控制发展为长期。从操控的面积和程度来看，则由局部发展为整体，是从单一的对精神或是肉体的掌控演变为对精神和肉体全体的完全操控。因此，通过上述归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狐狸附体》中的“附体”是从“蛇身”“毒瘤”“操控者”演化而来的，是中岛敦这一文学典型形象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中岛敦通过《狐狸附体》整篇的篇幅，对“操控者”进行了周到而细致的探究，不是只是从感觉上，不是只是停留在蹂躏人的意志这一层次上，不是只对被操控的狐疑，而是对身心完全被占领状态的全面检验，是对以往始终没能澄清的附体问题的彻底清算和归结。因此，可以说，本作品不应该是出于一时间的妄想文学上的一种反映，而是随着中岛敦创造实践不断深入所导致其主题渐次成熟和定格的必然结果。

三

在《狐狸附体》里，在依附于主人公夏克的形形色色的附体中，有弟弟的“手”和“头颅”。即弟弟的“手”和“头颅”作为独立体依附于夏克身上述说着其痛苦。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弟弟的“手”和“头颅”不是作为弟弟的肢体的一部分，而都是作为具有生命的独立的灵体而存在的。如前所述，在中岛敦文学中，这一形象的设定并非始于该小说，可追溯到《变色龙日记》的“内脏”。一般而论，如

“毒瘤”之类可以作为“附体”去理解，但在中岛敦的文学里，“内脏”“手”“头颅”都可成为具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并能依附在他人身上，从而形成了立体式的具有多元性的生命混杂的群居现象。

这一反常识的文学表现，是贯穿于中岛敦文学始终的，也可称之为中岛敦独到的灵体学说。这样的文学表述，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⁶⁾，同时更加烘托出中岛文学的独特性。那么，从中岛敦的教养的形成和其思想影响史的视角来看，这一奇特的思考及其文学表现是由何而产生的呢？它与哪一思想具有因缘关系呢？

众所周知，儒学是自中岛敦祖父抚山先生以来的家学，是中岛一家精神思想及文化修养形成的最为主要的来源之一。但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到中岛敦一代时，已是西学盛行，东方文化思想渐受冷落。尽管如此，中岛敦的骨子里依然被注入了东方文化的诸多精髓，同时他也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来自家学的各种熏陶。可以说，虽然这些沉积下来的文化修养和奠定的思想精神在中岛敦文学中的展现形式和含量不尽相同，但都是其较完整而真实的反映。

在中岛敦熟读过的《庄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类似中岛敦所描述的在一个主体中存在的多生命共存现象的相关论述。亦即，在《庄子》中，存在着“物化”和“万物皆化”之说。《庄子·天道篇》中有如下的记述。

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毋庸讳言，庄子所言的“物化”是指人之死亡后转生成其它生命的这一过程，这是庄子哲学思想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是，在庄子所言的这个“物化”的诸多现象和过程中，我们抽取其中较为典型的一段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

子祀、子舆、子梨、子来四人相与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中略）侵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侵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鸩灸；侵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中略）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庄子·大宗师》）

在这里，我们看到，子祀、子舆、子梨、子来四人所言的“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无”、“生”、“死”是不分尔我的统一体，其总和将构成人；但同时，这些个体又是在与他者有着本质区别的独立存在。亦即，“无”、“生”、“死”等既是人之整体之一部分，又是独立的个体存在。

如果说上述的记述在理解庄子有关思想上尚有些抽象费解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侵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侵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侵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等描述就一目了然了。在这里，可以化“左臂以为鸡”，化“右臂以为弹”，化“尻以为轮”，可以“以神为马”，换言之，人体的某一局部皆可转化为另一具有独立生命的其他存在。如果说“弹”和“轮”是无生命物的话，那么“鸡”无疑是具有生命的，而事实上，正如前所述，在庄子看来是“万物皆有灵”的，又是“万物皆化”的。

“以汝为鼠肝”“以汝为虫臂”是庄子生命观的又一表现形态，是庄子“化”思想的具体体现，是

与上述情况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上述的情形是生命轮回转生中由个体到局部和局部到个体的变化的话，那么，这两句的情形则是从整体到局部的“物化”。

如果我们将庄子上述记述稍加归纳，用“A, B, C…”代表个体及抽象事物，用“X, Y, Z…”代表实在的整体，用“I, II, III”代表局部的话，就会得出下列的三套公式：

$A \rightarrow I; B \rightarrow II; C \rightarrow III \dots$ ——“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

$I \rightarrow A; II \rightarrow B; III \rightarrow C \dots$ ——“化予之左膊以为鸡”“化予之右膊以为弹”“化予之尻以为轮”

$X \rightarrow I; Y \rightarrow II; Z \rightarrow III \dots$ ——“以汝为鼠肝”“以汝为虫臂”

将上述所代表的内容加以整理，可进一步简化为：

$A \rightarrow I; B \rightarrow II; C \rightarrow III \dots$ ——个体 \rightarrow 局部

$I \rightarrow A; II \rightarrow B; III \rightarrow C \dots$ ——局部 \rightarrow 个体

$X \rightarrow I; Y \rightarrow II; Z \rightarrow III \dots$ ——整体 \rightarrow 局部

如果将“个体”用“G”代替，“整体”用“O”代替，“局部”用“J”代替的话，上述公式可简约如下：

$G \rightarrow I \cdot II \cdot III \dots$

$J \rightarrow A \cdot B \cdot C \dots$

$O \rightarrow I \cdot II \cdot III \dots$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所表现出的“物化”模式并非是单一的，也不仅仅是双向的，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立体的动态和过程。毋庸讳言，庄子的多生命存在的形式及其“物化”是由十分复杂的诸多因素和过程所构成的“万物皆有灵”和“万物皆化”的混沌体，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所列几例，但是，可以说，上述三套公式基本上抽象出了其问题的实质，也基本上涵盖了庄子所有的“物化”种类。因此，这三个模式可称之为庄子“物化”全息图的缩影。

通过对上述庄子有关“物化”模式的考察，我们了解到了庄子“物化”形态的多样性及其实质所在。那么，我们再来反观中岛敦的文学，便不难发现其中微妙的相似性，其核心为“万物皆有灵”思想和具有灵性的万物的“物化”现象。

简言之，中岛敦的“伯父诗中蛇身”二字似乎活了起来，甚至感到它弯弯曲曲地扭动着身子在车厢内爬来爬去”（《斗南先生》），“对三造而言，这怪异而硕大的瘤子使他联想到了希腊悲剧中心术不正的坏神们，这怪异而硕大的瘤子似乎是这样一个丑陋的寄生者：它是个完全独立于人的肉体而心地极坏的个体存在，它蹂躏这人的意志，当其寄宿的主人入睡时，只有它偷偷地不眠并嘲笑着。”（《狼疾记》），以及本文重点考察的《狐狸附体》中的“被活活剥皮的野兽”以及形形色色的动物、事物以及人事等等，可归类到庄子“ $G \rightarrow I \cdot II \cdot III$ ”系统中；《狐狸附体》中的弟弟的“手臂”“头颅”以及其他作品中的“文字”等应归为庄子的“ $J \rightarrow A \cdot B \cdot C \dots$ ”系统；而“我，似乎是由组成我的物资要素（诸工

具)和操控它们的某个东西所构成的机器人。”(《变色龙日记》),应该是属于庄子“O→I·II·III”系统的。

如此看来,中岛敦关于“物化”的形式并没有超越庄子上述的三大模式,只是形式和方式有所变化而已。这,或许并非出于偶然,而是骨子中深深浸透着东方文化思想的中岛敦的一种无意识的自然外化。

总之,在中岛敦文学中,描绘出了形形色色的“万物有灵”现象,其大多都是以“附体”的形式来展现的。如果将这些形形色色的灵体分类的话,我们会发现:有的是完整的独立体;有的是整体的局部;有的是真实的存在;有的是抽象的事物;有的只表现在观念世界里。如果将这些现象归纳起来,便会看到,它们与其载体的关系也并非单一附体与被附体的关系,而是呈现出多元的交叉性和互动性,这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混沌体,并且,这个混沌体中的各个要素都是在不断地演化的过程当中。

通过如上的比照,可以看出,中岛敦文学中的“万物皆有灵”思想不但与庄子的有关学说极其相近,而且中岛敦所描述的各种“附体”现象实际上正是庄子的“物化”的一种折射。或许,中岛敦是在借助“附体”来演义自己的“物化”。

注:

- 1) 佐佐木充《〈山月记〉论——〈古谭〉的世界》(昭和40年9月,《国语国文学研究》第31号)
- 2) 鹭只雄《论中岛敦〈古谭〉》(昭和42年1月,《文言与文艺》第50号)
- 3)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就此一篇进行探讨,其余各篇将在日后陆续推出。
- 4) 同(1)
- 5) 同(2)
- 6) 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有与中岛敦上述雷同的文学现象。但是,出于慎重考虑,在行文中用了“极为罕见”的表述。但事实上,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能如此大面积地长期地探讨这一问题的,没有出中岛敦其右者。

附:本文系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小搞承蒙久保田启一教授的热忱指导和佐藤利行教授的特别垂爱,并得到编审各位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鸣谢。

(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 广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外国人客座研究员)